

WTO 再全球化理念、中国主张与制度回应

应品广¹ 姜明鑫²

(1.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上海 200336; 2. 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 江苏 苏州 215127)

摘要: 受多重危机影响, 贸易全球化的进程近年来逐渐放缓, WTO 为此提出再全球化理念, 推动实现全球贸易的安全、包容和可持续。这一理念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 包括 WTO 自身决策机制的缺陷、贸易保护政策的威胁以及各成员在关键议题上的分歧等。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也在积极探索自己的全球化理念, 并发展了许多与 WTO 再全球化理念高度契合的实践。在全球贸易治理转型的关键时期, 中国应当积极响应再全球化并在制度层面给予回应, 推动再全球化从理念向现实转变。

关键词: WTO; 再全球化; 全球贸易治理; 中国主张; 制度回应

中图分类号: DF9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1894 (2026) 03-0068-10

自 2008 年金融危机以来, 贸易在 GDP 中所占份额长期处于缓慢下降的趋势。^①加之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乌冲突等外部力量影响, 全球贸易脆弱化、离散化的态势进一步显现, 贸易政策不确定指数持续扩大。^②鉴于此困境, 世界贸易组织(WTO)提出了再全球化的新理念, 旨在通过再全球化“增强全球经济韧性, 实现更深入、更分散和更多样化的全球价值链, 将更多国家和地区从全球经济的边缘带入主流”。^③再全球化可能是重振全球对多边贸易体制信心的新契机, 也是中国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在此背景下, 本文探讨 WTO 再全球化理念的内涵、其所面临的挑战以及中国可能的制度回应。

一、WTO 再全球化的理念解构

根据 WTO《2023 年世界贸易报告》, 当前世界面临的紧迫挑战主要有: 维护和平与安全; 减少贫困与不平等; 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 WTO 总体上围绕安全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 3 个维度推进再全球化。

(一) 安全维度: 通过再全球化构建有韧性的全球贸易体系

安全问题一直是多边贸易体制的核心议题之一。WTO 的前身《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灾难性影响的制度性回应(Saggi, 2009)。但近年来, 国际社会对贸易的认知出现偏差, 更多地将贸易视为问题而非机遇。从数据看, 与“国家安全”相关的贸易政策数量正在急剧增加,^④贸易对安全的正向促进作用正被对外国供应商过度依赖的担忧所掩盖。对此, WTO 通过援引实证研究明确了贸易与安全的正向关联: 一方面, 贸易开放程度和军事冲突呈现显著的负相关性, 依赖全球经济的国家往往更加和平(Barbieri and Peters, 2003); 另一方

作者简介: 应品广,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组织学院(贸易谈判学院)教授, 研究方向: WTO 与全球经贸治理; 姜明鑫, 北京德和衡(苏州)律师事务所律师, 研究方向: 世界贸易组织法。

① World Bank.Global Trade as a Share of GDP,1970-2021[EB/OL].2023,World Bank.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E.TRD.GNFS.ZS?most_recent_year_desc=false. [2023-07-21](2023-09-14).

② WTO.Global Trade Growth Loses Momentum as Trade Tensions Persist[EB/OL].2019,WTO.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pres19_e/pr837_e.htm. [2019-04-02](2023-10-17).

③ WTO.World Trade Report 2023:Re-globalization for a Secur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Future[EB/OL].2023,WTO.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3_e/wtr23_e.pdf. [2023-11-13](2023-11-20).

④ WTO.Trade Concerns Database[EB/OL].2026,WTO.<https://tradeconcerns.wto.org/en>. [2026-03-18](2026-04-05).

面,贸易体系的互联互通性能够提升经济体应对危机的能力,助力经济快速恢复。^①从2018年开始,中美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导致这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成本急剧上升,但贸易的增长没有停滞(Fajgelbaum et al., 2021)。另外,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引发的卫生和经济危机给世界贸易体系带来了又一次冲击,现有贸易体系却表现得比许多人预期的更有韧性。^②

因此,WTO 倡议通过再全球化建立一个更安全的世界。一是将贸易体制扩大到更多的经济体和领域中,将边缘地区、行业和领域引入全球经贸体系,在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同时解决部分成员对单一经济体过分依赖的担忧。二是加强对贸易限制措施的规范,保证成员不对一些必要性商品(比如粮食)施加出口限制。三是优化 WTO 的职能设计,减少安全与贸易之间的相互负面影响。

(二) 包容维度:通过再全球化促进平等和减少贫困

贸易本应推动国家之间经济趋同和贫困人口的减少(Macmillan, 2009)。但是,正如 WTO 总干事伊维拉指出,过去的全球化模式存在的问题是“许多贫穷国家甚至富裕国家的穷人和中下层人民没有充分享受贸易带来的收益”。^③从区域来看,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贸易增长速度长期滞后于全球平均水平;从经济体内部来看,进口竞争带来的就业流失集中于特定部门和区域,导致不同部门、区域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Autor et al., 2015)。失业与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所引发的社会问题催生了反全球化的思潮,部分国家决策者期望使用单边政策支持国内产业以促进制造业回流,但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全球贸易开始向“碎片化”的趋势发展。

过去的全球化模式虽然带来了种种问题,但 WTO 认为挑动全球贸易走向“碎片化”不是有效解决方案:其一,“碎片化”将扩大发展中经济体与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差距,仅有少数经济体能通过贸易转移获得短期收益;其二,“碎片化”导致的全球供应链中断可能造成劳动力市场混乱,出口贸易部门工人被迫转向薪资更低的工作(Carroll and Hur, 2023)。另外,“碎片化”的全球贸易还会增加中小微企业的贸易成本、减少妇女的工作机会,进一步加剧不平等(Brown et al., 2019)。

针对上述问题,WTO 提出通过两大路径增强贸易的包容性:一是全面实施《贸易便利化协定》,推进《投资便利化协定》谈判,减少对边缘群体的贸易壁垒,帮助降低贸易成本;二是加强服务贸易、数字贸易、农业贸易等包容性更强的部门的国际合作。对此,WTO 在过去几年围绕上述方向已经作出许多努力,推动了包括《服务贸易国内规制》《投资便利化协定》《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等诸多协定的进一步谈判。WTO 尤其强调了数字贸易的包容性价值,认为数字贸易可以为那些在全球化进程中没有广泛获益的经济体提供新的机会,缩小其与主流经济体的运输成本和制度劣势。

(三) 可持续维度:通过再全球化实现贸易与环境的良性互动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提出了 17 项目标,其中目标 12(确保可持续消费和生产模式)与目标 13(应对气候变化)与贸易议题密切相关。WTO 再全球化理念的可持续维度核心是厘清贸易与环境的互动逻辑,通过国际合作构建贸易与环境协同发展的制度体系,让贸易成为推动全球环境治理的重要力量。

WTO 认为贸易与环境存在双向影响。贸易规模的扩张可能加剧环境压力,比如与贸易有关的温室气体排放绝大多数与生产有关(Cristea, 2013)。但是,贸易的过程也有助于环境技术的传播,

① WTO. World Trade Report 2021: Economic Resilience and Trade[EB/OL]. 2021,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booksp_e/wtr21_e/00_wtr21_e.pdf. [2021-11-16] [2024-01-07].

② 根据《2023 年世界贸易报告》,全球贸易量在疫情暴发后的一年内就恢复到疫情前水平,而且在医疗用品的快速生产和分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俄乌冲突中,由于各国政府基于 WTO 承诺开展合作,粮食价格大幅上涨和供应短缺等情形并没有发生,而且受冲突严重影响的国家的贸易展现了惊人的恢复力。

③ Okonjo-Iweala. We Need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and Solidarity More Than Ever[EB/OL]. 2022, WTO. 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spno_e/spno32_e.htm. [2022-11-22] [2023-10-02].

刺激环境技术的创新和投资。实证研究发现，发达经济体环境技术的进步几乎能够完全抵消基于贸易扩张的负面影响（Ustyuzhanina, 2022）。发展中经济体通过出口扩张实现收入增长，进而提升对清洁环境的需求，也能形成间接的“技术效应”推动环境改善（Bombardini, 2020）。同时，不同强度的环境政策也会对贸易产生影响。比如，破碎的环境税收和排放监管制度将会增加出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的成本，支持生产或出口的环境补贴可能将利润从国外转移至国内从而造成贸易扭曲，补贴驱动的全球竞争可能导致小型经济体在贸易中处于更不利的地位等。

基于上述理解，WTO 提出贸易与环境协同发展的 3 个核心建议：一是加强数字贸易国际合作，增强数字贸易份额，减少对化石能源的贸易需要；二是协调政府加强对清洁技术研发的支持，加快绿色转型；三是推进国际环境政策的进一步协调，同时关注发展问题，给予发展中经济体特殊和差别待遇，确保应对环境挑战的政策不会对边缘经济体不利。WTO 为此举行了贸易与环境可持续性结构化讨论（TESSD）第一次会议，推进了涵盖气候措施、补贴、环境商品和服务以及循环经济 4 个非正式工作组的工作。^①

（四）WTO 再全球化理念的坚守与变革

WTO 再全球化理念反映了 WTO 对全球化方向转变的基本认识：一是贸易的安全观升级，将安全定义为地缘与经济安全的综合概念，探寻贸易在维护经济安全、增强经济韧性方面的作用；第二，贸易的发展逻辑重塑，依托数字、智能等新技术催生数字贸易等新形态，为包容和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撑；第三，贸易的价值观拓展，脱离传统“唯增长”导向，将环保、减贫、性别平等、中小企业、劳动保护等社会价值与生态价值纳入考量，推动贸易向增质并重、均衡发展转型。

WTO 再全球化理念在揭示变革的同时也明确了仍需坚持的内容。第一，全球应当继续拥抱贸易，而非拒绝贸易。尽管贸易中的安全观、价值观在发生调整，但是促进贸易、吸引外资仍是各国发展经济、创造就业和提升福利的重要途径。第二，多边主义仍是治理全球贸易的主流理念。WTO 用大量的证据证明了统一的贸易体系有利于和平与经济，“碎片化”可能符合部分国家的短期利益，但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挑战。第三，坚持规则导向的国际合作。规则是机制有序运转的保障，是解决纠纷的依据，规则导向的国际合作可以降低目前全球贸易的不稳定性。

二、WTO 再全球化理念面临的挑战

WTO 再全球化理念强调多边合作和全球解决方案的重要性，对应对当前的全球性危机具有重要意义。但就现实情况来看，实现 WTO 再全球化理念仍面临诸多挑战。

（一）WTO 自身的决策机制存在缺陷

实现 WTO 再全球化理念既需要对旧有规则进行再平衡，也包含新兴议题的塑成。受制于协商一致原则和成员驱动特性，WTO 很难在短期内实现上述目标。

协商一致作为 WTO 规则谈判的基本原则，在历史上因保障了国际主体平等而具有重要意义。但现阶段的现实问题是，全体成员在多边贸易谈判场合无法取得广泛共识。因此不得不承认，WTO 协商一致原则制约了谈判效率和多边谈判的进展。更大的困难在于与其他很多国际组织不同，WTO 是一个“成员驱动型”的国际组织。成员在 WTO 运行的各个环节发挥主导作用，而秘书处仅仅起到提供谈判场所和技术援助的辅助性作用，其在政策建议、资金安排等方面的权限远不如世界银行

^① WTO.Members Advance Work on Environmental Issues in Specific Sectors after Stocktaking Even[EB/OL].2023,WTO.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3_e/tessd_17mar23_e.htm. [2023-03-17] (2024-02-23).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①WTO 前副总干事沃尔夫曾坦言：“成员驱动的特性为所有成员提供了平等参与的机会，但当成员们陷入不可调和的矛盾时，WTO 作为独立的组织机构却很难发挥功能。”^②因为疲于应付成员间的利益平衡，缺乏对全球贸易发展的全局性考量，WTO 难以主动作为引领全球贸易向更合理、均衡的方向发展。

因此，WTO 自身需要克服两方面挑战：一是在坚守民主参与和决策正当性的前提下，对协商一致原则进行灵活调整，提升决策效率；二是推动自身组织身份转型，强化在全球经贸治理中的主导作用，从“利益平衡者”向“规则引领者”转变。

（二）贸易保护政策对再全球化构成威胁

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全球经贸格局发生深刻调整，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为维护其经济地位和全球影响力，频繁调整贸易政策，其政策的内顾倾向、保护主义色彩日益凸显（徐崇利，2023），成为 WTO 再全球化理念落地的重要外部障碍。美国近年来提出“以工人中心”“供应链安全”“制造业回流”等贸易政策主张，^③其政策理念呈现出 3 个方面特征：一是从追求“自由贸易”转向标榜“公平贸易”；二是将安全利益的考量置于经济利益之上；三是以“共同价值观”为国际经贸合作的基础。

从表面上来看，这些政策理念存在一定合理性。比如，自由贸易体系往往会导致弱肉强食的局面，公平贸易则是对自由贸易中消极因素进行修正（何志鹏和孙璐，2011），因而对公平的追求符合国际贸易的价值取向。另外，在安全问题上，新冠肺炎疫情和俄乌冲突充分揭示了全球供应链体系的脆弱性，美国寻求建立有弹性的供应链体系亦无可厚非。但是，全球性问题需要全球共同解决，基于“内顾倾向”实施的政策最终将演变为贸易保护主义，对再全球化理念形成多重冲击。

其一，真正的公平贸易所提倡的互惠互利原则考虑了各国发展阶段的差别，体现的是以当期优惠换取后期开放的理念。美国“公平贸易”政策在手段上追求“对等开放”，忽视各经济体之间发展水平的不同，可能会造成新的贸易失衡。而且“公平贸易”政策推动下部分行业的短暂增长，实则是以其他行业、生产环节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王孝松和张瑜，2022），进一步加剧了其国内矛盾。

其二，美国以“共同价值观”为推手，采取“本土化 + 近岸化 / 友岸化”的供应链策略。在国内对关键产业实施优惠政策（马雪，2022），在国际上实行东西双线并举、三点发力，打造供应链在全球三大板块的联动格局（孙成昊和申青青，2023），这种基于政治逻辑和安全观的供应链重构，强行扭转了自发的全球经济秩序（陈若鸿和曲海，2022），与再全球化期望的“多元化”的弹性供应链背道而驰。

其三，美国联合盟友构建基于价值观的“小多边主义体系”（苏可桢和沈伟，2023），将不符合“市场导向”价值观的对象国排除在外，尤其将打压中国作为行动目标，可能导致的结果是原有体系被基于价值观划分的小多边所拆解（任琳和郑海琦，2022），统一的全球经贸体系可能因此分化为以中、美为首的二元经贸体系，而在中美“脱钩”的情况下，处于“脱钩趋势”范围内经济体的贸易成本显著提高（Métivier et al., 2023），再全球化所关注的边缘经济体将可能遭受严重的损失。

（三）再全球化关注的议题分歧严重

再全球化所包含的安全、平等、可持续等领域，在 WTO 规则框架下可能具象为国家安全例外、

① PIPE.WTO 2025: Constructing an Executive Branch[EB/OL].2022,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https://www.piie.com/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wto-2025-constructing-executive-branch>. [2022-05-06] (2024-03-18).

② WTO.DDG Wolff Outlines Possible Responses to Calls for WTO Reform[EB/OL].2020,WTO.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1_e/ddgaw_13jan21_e.htm. [2021-01-13] (2023-11-11).

③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Strategic Plan FY 2022-FY 2026[EB/OL].2022,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USTR%20FY%202022%20-%20FY%202026%20Strategic%20Plan.pdf>. [2022-03-01] (2024-05-23).

数字贸易规则、环境规则等多项议题。WTO 主要成员在这些议题上仍然存在较大分歧。

第一，安全议题的分歧集中于国家安全例外条款的适用边界。从安全例外条款的谈判史来看，GATT 第 21 条 b 款所提及的“基本安全利益”仅限于军事和国防安全利益，后在美国钢铝产品关税案等争端解决实践中，“基本安全利益”的内涵逐渐泛化，扩张至经济安全领域（李晓玲，2023）。在供应链安全背景下，以经济相互依赖产生的供应链脆弱性成为援引安全例外的合法依据或贸易保护主义的新托词（杨梦莎，2023）。因此，在安全例外条款的改革问题上，美国强调“经济安全就是国家安全”，^①希望能将经济安全纳入“基本安全利益”的范畴；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则主张在 WTO 框架下对援引安全例外条款予以进一步澄清和规范，防止条款被滥用侵蚀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性和权威性。^②

第二，包容性议题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发展利益平衡与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两方面。发达国家可能更倾向于推动其他国家贸易自由化，主张减少或取消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发展中国家则强调自身的发展阶段特征，坚持特殊与差别待遇是其参与全球贸易的重要保障。在数字贸易规则构建上，各国在数字自由、数字安全、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电子传输关税等核心问题上的价值取向和政策主张差异显著（张荣楠，2021）。WTO 框架下的电子商务谈判也仅就涉及数字便利化、透明度、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的部分条款达成实质性结论，对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电子传输关税等关键议题的分歧仍未得到解决。

第三，可持续议题的分歧主要聚焦碳关税和绿色补贴两大问题。就碳关税而言，欧美相继推出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与“清洁竞争法案”（CCA），二者在征收标准方面存在显著差异。CBAM 采取“绝对碳含量标准”，CCA 采取“相对碳含量标准”，相比之下后者更具灵活性和保护主义色彩（李岚春和陈伟，2023）。另外，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对“碳关税”立法多持怀疑态度，认为该问题应当在多边框架下进行讨论。^③在绿色补贴问题上，分歧主要源于美欧对绿色经济优势的激烈争夺，双方近期加大可再生能源激励力度，形成补贴竞赛。欧盟除运用传统贸易救济工具外，还创新引入竞争政策进行反制。各类激励与反制措施频繁出台，使得绿色补贴政策协调更趋复杂、充满不确定性。

三、WTO 再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主张与实践

经过“入世”20 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全球治理体系中扮演的角色实现了从被动接受者到重要参与者的转变，正逐步成为全球贸易治理的引领者。中国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理念，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实践载体，探索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理念，其核心内涵与 WTO 再全球化理念的安全、包容、可持续三大维度高度契合。在 WTO 再全球化语境下，中国围绕三大核心维度提出了明确的全球化主张，并开展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为再全球化理念的落地提供了中国样本。

（一）坚定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

多边贸易体制是实现再全球化的制度前提，也是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的核心保障。中国作为多边主义的坚定维护者，全面参与 WTO 各项工作，与各成员共同推动 WTO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① The US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EB/OL]. December 2017, <https://trumpwhitehouse.archives.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 [2017-12-18] (2024-02-14).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EB/OL]. http://images.mofcom.gov.cn/sms/201905/2019_0524100740211.pdf. [2019-05-14] (2024-04-03).

^③ 中国一带一路网. 中方在世贸组织提交碳边境调节机制政策相关提案[EB/OL]. <https://www.yidaiyilu.gov.cn/p/0RT25A3Q.html>. [2023-11-15] (2024-04-04).

第一,中国推动多边贸易谈判取得积极进展。中国积极促成《贸易便利化协定》达成,实现WTO近20年多边贸易协定“零突破”,并作为首批批准成员,在G20主席国任内推动多国完成国内批准程序,助力该协定生效。中国还推动达成WTO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农产品公平贸易规则《关于出口竞争的部长决定》,促成各方全面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此外,中国推动《信息技术协定》扩围谈判收官,达成WTO成立以来首个工业品关税减让协议,进一步降低了信息技术产品的贸易成本。

第二,中国主动引领新议题的多边和诸边谈判。针对目前国际投资规则“碎片化”问题,中方联合12个WTO成员发起成立“投资便利化促进发展之友”,吸引70多个成员参与,为相关多边讨论营造良好氛围。2017年金砖会议期间,中方推动达成《金砖国家投资便利化纲要》,首次在多边层面明确投资便利化基本要素,继2016年G20杭州峰会《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后,再次为全球投资规则构建贡献中国智慧。在中方积极推动下,2023年7月6日WTO宣布《投资便利化协定》文本谈判正式结束,^①填补了多边投资规则的空白。

第三,中国积极响应“促贸援助”倡议。在加强最不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培训经贸人员、提高生产能力、促进贸易便利化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对外援助举措,全力支持发展中国家融入多边贸易体制。包括发起“最不发达国家及加入世贸组织中国项目”,实施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支持非洲改善内外贸易和投资软硬条件等。

与此同时,中国始终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作为全球供应链关键一环,中国既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合作的参与者、受益者,更是坚定的维护者、建设者。在国内层面,中国致力于持续完善产业体系,立足超大市场规模,持续放宽市场准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运行提供有力支撑和广阔空间。中国不断强化数字化赋能,推动产业领域全方位、全链条数字化转型升级,加强面向多元化应用场景的技术融合和产品创新,完善5G、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供应链体系。

在国际层面,中国坚定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深刻把握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发展规律,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主张国际合作,并在此立场下倡导全球“稳链保供”。^②中国还举办了全球首个以供应链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会议期间,中国贸促会与工商界代表共同发布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互联互通北京倡议》,强调要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通畅,携手构建更具平等性、包容性和建设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伙伴关系,合力构筑安全稳定、畅通高效、开放包容、互利共赢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

(二) 坚持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促进减贫与经济平等

中国全球化理念在目标设定上并非像“西式全球化”那样以“控制”为工作重心,而是有一个清晰的前提,即平等、开放和包容(伍抱一和伍山林,2020)。这种包容性体系强调关注每个不同角色的独特功能,新老权利结构共生互嵌,经济上更注重平等性与可持续性,政治上强调协调共商(王栋,2018)。针对传统全球化所形成的“中心—边缘”体系导致的全球发展状态不平衡问题(何志鹏,2023),中国的全球化理念致力于实现发达国家—新兴国家—边缘国家相互联通的状态,3个世界的互联互通将超越高层全球化与低层全球化的对立,缩小中心—边缘间的等级差距(王栋和曹德军,2017)。换言之,中国强调通过协调共商形成一个“去中心化”新型国际关系网络,推动实现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等、可持续方向发展。

① WTO.Investment Facilitation Negotiators Announce Deal on Agreement's Text[EB/OL].2023,WTO.https://www.wto.org/english/news_e/news23_e/infac_06jul23_e.htm. [2023-07-06] [2024-03-18].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在全球通力合作中稳链保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与稳定国际论坛成果丰硕[EB/OL].新华社.https://www.gov.cn/xinwen/2022-09/20/content_5710804.htm. [2022-09-20] [2023-10-25].

对于实现包容性的全球化，WTO 提出减少贫困与促进经济平等两个主题。在减贫方面，中国倡导要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和“增长之路”。^①通过增强共建国家的减贫能力，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粮农治理，帮助亚洲、非洲、南太平洋、拉美和加勒比等地区推进乡村减贫。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中国与相关国家积极推进产业园区建设，引导企业通过开展高水平产业合作为当地居民创造就业岗位。世界银行报告预测，共建“一带一路”有望帮助全球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②

在促进经济平等方面，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强调全球发展要坚持普惠包容，着力解决国家间和各国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 2026 年 5 月 1 日起，中国对 53 个非洲建交国落实 100% 税目产品零关税举措。在援助实践中，中国免除了非洲多国对华债务，将南南合作援助基金整合升级为“全球发展和南南合作基金”并为此增资；坚持硬援助与软援助相结合，发展援助与互利合作相结合，向发展中国家分享发展经验和行业技术，培育其经济“造血”机能。此外，中国还促进建立广泛、可持续的合作网络，推进全球发展知识网络建设，成立“中国—东盟知识网络秘书处”，探索设立“中国—中亚发展知识网络”“中国—非洲发展知识网络”等区域支柱网络和专题性网络建设。^③团结、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正在加快形成。

（三）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进环境可持续发展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提出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④加强绿色贸易与应对气候变化是该理念下的两个重点合作领域。

WTO 认为，帮助发展中经济体绿色转型、将贸易与环境治理相结合不仅有助于应对全球环境挑战，还能够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贸易与发展机会。中国认识到贸易投资是绿色发展的重要引擎，将绿色发展作为全球贸易投资的新增长点。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贸易畅通专题论坛期间，中方与有关国家共同发布《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国际经贸合作框架倡议》。根据该倡议，参与方将在多方面强化绿色发展合作，包括营造绿色政策环境；鼓励低碳技术、生物技术分享与贸易；支持建立低碳贸易示范点；鼓励清洁能源和绿色基建领域的投资合作；加速绿色转型与数字化绿色化技术创新。

WTO 强调，不同的经济体在处理环境问题上有不同的能力并承担不同的责任。“一带一路”的参与国家主要以发展中国家为主，部分国家会采取牺牲环境换取发展机会的经济政策，而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则强调加强与有关国家对话交流合作，在建立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各方全面实施《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保实施应对环境挑战的政策不会给贫困经济体带来压力。另外，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积极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南南合作计划，推进低碳示范区建设和减缓、适应气候变化项目实施，提供绿色低碳和节能环保等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物资援助，能够加强沿线国应对气候挑战的能力。

WTO 将数字贸易视为实现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中国也将数字经济合作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推动数字贸易与绿色发展的深度融合。2017 年 12 月，中国同多国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⑤与多个国家签署“数字丝绸之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建立“丝

① 习近平把“一带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EB/OL].新华社.https://www.gov.cn/xinwen/2021-04/20/content_5600778.htm. [2021-04-20] (2024-01-05).

② World Bank.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EB/OL]. 2018, World Bank. <https://www.worldbank.org/en/topic/regional-integration/brief/belt-and-road-initiative>. [2019-06-18] (2026-02-11).

③ 新华社研究院. 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 [EB/OL]. https://www.xhinst.net/gdzk/NewChinaResearch/20230918/19434754_全球发展倡议实践成就与世界贡献智库报告.html. [2023-09-20] (2025-08-19).

④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意见》（发改开放〔2022〕408号，2022年3月16日发布）。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发布[EB/OL]. http://www.cac.gov.cn/2018-05/11/c_1122775756.htm?from=singlemessage. [2018-05-11] (2024-03-16).

路电商”双边合作机制。中国还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积极推动全球数字治理规则建设。

四、WTO 再全球化理念的中国制度回应

WTO 再全球化理念重新诠释了贸易的核心价值，明确了未来全球经贸治理与国际合作的重点方向。在此背景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应当积极拥抱再全球化的潮流，并在制度层面给予有力的回应。同时，面对贸易保护政策对再全球化的冲击，中国也应当做好制度对冲的准备，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引导全球贸易向更加安全、包容、可持续发展的方向。

（一）深度参与 WTO 改革，提出制度性建议

中国可以通过提出符合自身利益和全球贸易发展趋势的改革方案，积极参与 WTO 改革进程。针对 WTO 谈判机制不畅、决策效率偏低等问题，中国可以在尊重协商一致精神的同时，推动决策机制的优化改革：一方面，继续发展“联合声明倡议”所形成的良好实践，用“联合声明倡议”等诸边谈判模式推动在某些关键领域率先实现突破，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谈判经验；另一方面，对协商一致制度本身提出建设性的改革建议，如引入票决制度作为协商一致的补充；针对一些长期悬而未决的议题明确决策时限；增强谈判透明度等。

在完善决策机制的基础上，中国可以围绕安全、包容、可持续等议题向 WTO 提出改革建议。在安全方面，至少可以提出 3 个方面建议：一是要求对安全例外作出权威性解释或者修正，明确经济安全利益的界定标准，厘清可纳入“基本安全利益”的经济安全范畴；二是完善安全例外配套制度，比如建立贸易与安全委员会，对条款中的关键性术语展开讨论以寻求共识，建立相应的安全通报制度，对通报政策展开审议、评估和监督；三是建立全球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定期评估全球供应链风险情况，并向成员通报以确保供应链的稳定性、效率和可持续性。

在包容性方面，中国可适当淡化“发展中国家地位”等“硬性”条款的分歧，聚焦 WTO 如何提升边缘经济体贸易能力方面的“软性”制度建设，比如制定在数字贸易方面的技术援助年度计划，建立帮助边缘经济体完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提升贸易融资能力的多边合作机制等。

在可持续性议题上，中国一方面可以提议 WTO 加强对环境贸易政策的监管和协调，尤其是对碳边境管理方面的政策，应当着重关注政策的包容性，防止形成绿色壁垒；另一方面，可以提出关于“绿色补贴”的中国方案，打破“绿色补贴竞赛”的态势，推动各国在绿色补贴政策上实现协同与平衡。

（二）加快形成对冲性制度，维护供应链安全

美国的“友岸外包”、欧盟的“欧盟经济安全战略”等政策，凸显了全球供应链的地缘政治化趋势。可以预见，全球供应链在未来将进入全面的结构性调整期，中国作为世界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有必要构建对冲性的制度来保障供应链安全。

第一，建立供应链安全预警和评估机制。中国虽然拥有世界上最为完整的产业链，但在部分关键生产和投入环节，仍然高度依赖外国资源和技术，存在潜在的断链风险。对此，中国应构建一套科学、全面、动态的供应链安全评估机制，全面梳理现有供应链体系，识别风险点与薄弱环节，及时跟踪分析外部环境与市场变化，重点考量美欧供应链政策对关键领域市场的影响，预测可能出现的风险和挑战。

第二，积极构建区域经贸协定网络，推动供应链多元化发展。一是充分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

伴关系协定》(RCEP)的制度红利,构建多元化的供应链网络,增强区域内供应链合作的吸引力(李加林等,2023)。二是加快推动与关键供应链伙伴达成自贸协定。比如,中日韩3国在供应链方面具有较强的互补性(潘怡辰等,2023),依托RCEP的原产地累积规则,可以加强中日韩在供应链领域的投资与产业布局,以区域合作成果推动中日韩自贸协定的达成,强化3国供应链的韧性与协同性(刘文和徐荣丽,2022)。三是依托APEC框架,整合中国参与的双边、区域经贸安排,构建统一的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网络,对冲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排他性影响,维护亚太地区供应链的稳定运行。

第三,依托区域贸易协定建立相应供应链合作框架,提供全球供应链公共产品。中国应在区域贸易协定中纳入供应链预警、数字化、可持续发展、供应链金融等内容,构建系统性的供应链合作框架,与美西方的排他性供应链体系形成对冲,打破其设置的制度性壁垒。此外,中国还可以通过持续提供供应链博览会、供应链论坛等公共产品,加强全球供应链的多边讨论,积极融合边缘经济体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建设。

(三) 围绕安全、包容、可持续深化国内改革

从供应链安全视角出发,中国不仅要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配的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数据库、评价体系及预警机制,更应充分发挥制度优势,强化供应链方面的支持举措。作为全球供应链的关键一环,中国拥有强大的供应链连接力,但在关键性能源、矿产及高技术产业方面仍面临诸多挑战。因此,中国需要加快优化供应链结构,推动其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进程,提高供应链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同时,鼓励企业“走出去”,整合海外资源,增强供应链的掌控力。

在促进包容性发展方面,中国在中小微企业赋能和妇女数字赋能方面大有可为。一方面,可以通过强化竞争政策实施,特别是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执法,确保中小微企业享有公平竞争的环境;另一方面,加大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普及数字化技术知识,助力中小微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同时,积极推动构建妇女数字赋能、经济赋能的中国方案,通过技能培训、创业平台等方式,提升妇女的数字化能力和贸易能力。

在环境可持续性方面,中国应强化碳排放的监管与核算工作,通过建立严格、透明的碳排放监管体系,确保企业真实、准确报告碳排放数据,为碳关税政策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优化绿色补贴结构,实施差异化政策,确保补贴资金精准投放。加强绿色补贴资金的监管和评估,防止滥用和浪费。此外,中国可结合碳关税和绿色补贴政策,共同推动国内环境可持续发展,形成良性互动。例如,将碳关税收入用于支持绿色补贴政策,实现政策间的有效衔接和协同。

五、结语

WTO提出的再全球化理念表达了WTO对全球贸易观念转变的基本认识,强调多边合作的重要性,肯定了多边主义是全球化应当坚持的基石。它呼吁各国放下分歧,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然而,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国际环境日趋复杂,地缘政治博弈愈演愈烈,贸易保护主义势头不断抬头,在这样的背景下,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对于中国而言,这一挑战或许正是进一步参与全球治理的契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一直积极倡导开放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再全球化则是全球化发展的新阶段。中国应当积极响应再全球化的号召,并在制度层面给予回应,与各国一道共同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的完善和发展,为构建更加安全、包容、可持续的全球化新格局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参考文献:

- [1] 陈若鸿,曲海.美国供应链安全思维的转向及我国的应对[J].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
- [2] 何志鹏.全球化、逆全球化、再全球化:中国国际法的全球化理论反思与重塑[J].中国法律评论,2023(2).
- [3] 何志鹏,孙璐.贸易公平与国际法治:WTO多哈回合反思[J].东方法学,2011(2).
- [4] 李加林,陈炎伟,陈秋华.RCEP成员国贸易便利化对中国外贸的影响研究[J].亚太经济,2023(6).
- [5] 李岚春,陈伟.欧美碳边境调节机制比较及对我国影响与启示研究[J].世界科技研究与发展,2023(6).
- [6] 李晓玲.WTO安全例外条款:实践演进、路径选择与中国因应[J].国际法研究,2023(3).
- [7] 刘文,徐荣丽.RCEP与中日韩FTA关税减让的贸易效应测度比较[J].山东社会科学,2022(9).
- [8] 马雪.美国减少对华供应链依赖的路径及困境[J].现代国际关系,2022(10).
- [9] 潘怡辰,蔡桂全,宋云潇.供应链重构与日韩对华投资再选择[J].国际贸易,2023(11).
- [10] 任琳,郑海琦.虚弱的联盟扩容与全球治理秩序[J].社会科学文摘,2022(5).
- [11] 苏可桢,沈伟.美国“价值观同盟”视角下的经贸规则全球化与中国因应[J].亚太经济,2023(3).
- [12] 孙成昊,申青青.拜登政府的供应链重塑战略:路径与前景[J].美国研究,2023(1).
- [13] 王栋.再全球化——理解中国与世界互动的新视角[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 [14] 王栋,曹德军.中国引领世界进入再全球化进程[J].人民论坛,2017(32).
- [15] 王孝松,张瑜.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对全球化的影响探究[J].经济学家,2022(5).
- [16] 伍抱一,伍山林.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英美经验与中国思路[J].财经研究,2020(12).
- [17] 徐崇利.美国贸易政策及法律策略之变:样态与机理[J].中国法律评论,2023(2).
- [18] 杨梦莎.安全例外条款的功能演进与司法审查标准——以供应链安全为视角[J].政法论坛,2023(4).
- [19] 张莱楠.全球数字治理:分歧、挑战及中国对策[J].开放导报,2021(6).
- [20] Autor, D. H., Dorn, D., Hanson, G. H. The China Syndrome: Local Labor Market Effects of Import Competi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3(6).
- [21] Barbieri, K., Peters, R. A. Measure for Mis-measure: A Response to Gartzke & Li[J].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003, 40(6).
- [22] Bombardini, M., Li, B. Trade, Pollution and Mortality in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0, 125.
- [23] Brown, R., Liñares-Zegarra, J., Wilson J, O. 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Brexit on UK SMEs: Regional Evidence and Public Policy Implications[J]. Regional Studies, 2019, 53(5).
- [24] Carroll, D., Hur, S. On the Distributional Effects of International Tariffs[J]. 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 2023, 64(4).
- [25] Cristea, A., Hummels, D., Puzzello, L., et al. Trade and the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from International Freight Transport[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013, 65(1).
- [26] Macmillan, E. Trade and Poverty Reduc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The Economic Effects of Trade on Poverty Reduction: Perspectives from the Economic Literature[J]. Cambridge Books, 2009.
- [27] Saggi, K. Trade in Goods: The GATT and Other Agreements Regulating Trade in Goods[J]. World Trade Review, 2009, 8(3).
- [28] Ustyuzhanina, P. Decomposition of Air Pollution Emissions from Swedish Manufacturing[J]. Environmental Economics and Policy Studies, 2022, 24(2).
- [29] Fajgelbaum, P., Goldberg, P. K., Kennedy, P. J., et al. The US-China Trade War and Global Reallocatio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21.
- [30] Métiévier, J., Bacchetta, M., Bekkers, E., et al. International Trade Cooperation's Impact on the World Economy[R]. WTO Staff Working Paper, 2023.

WTO's Re-globalization Concept and China's Proposals and Institutional Responses

YING Pinguang JIANG Mingxin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slowdown in trade globalization in recent years due to multiple crises, WTO has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re-globalization, which aims to make global trade secure, inclusive and sustainable. The realization of this concept needs to overcome many difficulties, such as shortcomings in the efficiency of the WTO's decision-making, the challenge of trade protectionism, and differences among its members on key issues. China, as a responsible big country, is also actively exploring its own concept of globalization and has developed many practices that are highly compatible with the concept of re-globalization. In this critical period of transformation of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China should actively respond to the concept of re-globalization and its institutional response, so as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re-globalization into reality.

Keywords: WTO; re-globalization; global trade governance; China's propositions; institutional response

(责任编辑:金孝柏)